

试论纳赛尔的阿拉伯政策

王 冰

(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学院, 上海 200083)

摘 要: 阿拉伯联合与阿拉伯统一是纳赛尔阿拉伯政策的核心, 这既是纳赛尔在情感上对"阿拉伯民族"的认同, 也是阿拉伯人的同质性所诱导; 它为纳赛尔在"阿拉伯圈子"中推行积极主动的外交政策提供了动力, 同时也为埃及干涉其他阿拉伯国家内政提供了口实; 纳赛尔在借助阿拉伯政策拓展其外交活动空间的同时, 也限制了自身回旋的余地。

关键词: 纳赛尔; 阿拉伯政策

中图分类号: K41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 - 5636 (2007) 06 - 0056 - 04

20 世纪 50 年代纳赛尔执政期间的埃及, 阿拉伯政策构成了当时埃及外交的主要内容。纳赛尔毕生致力于阿拉伯联合与阿拉伯统一事业, 因为他深知这对于埃及独立与发展的重要性, 以及对于阿以关系的处置和抵制超级大国侵蚀的重要意义。纳赛尔的这种阿拉伯政策在当时乃至以后、主观上和客观上所造成的影响和后果, 福兮祸兮, 都是可圈可点的。

—

1952 年纳赛尔执掌埃及政权后的最初几年, 埃及较少地参与整个阿拉伯世界的事务。这一时期埃及新领导人把主要的精力都放在了解决其统治的稳定性与合法性, 以及处理同英国的关系上, 所以此时的埃及几乎完全孤立于阿拉伯世界之外, 但这种局面在 1953 年 5 月美国谋求在中东建立针对苏联的冷战防御体系时发生了改变。由于埃及当时所奉行的中立和不结盟政策, 抵制加入西方国家控制的防御联盟, 但这却导致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那就是如果其它的阿拉伯国家要加入的话, 埃及将会发现自己的政治和战略利益受到损害。这就使埃及不仅要抵制这些西方国家控制的防御体系, 而且还要积极地阻止其它阿拉伯国家的加入。在这种情况下, 埃及为了要摆脱自己的孤立地位, 而开始实行积极的阿拉伯政策, 并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地强调诸如"阿拉伯联合"的概念。1953 年 7 月, "阿拉伯之声"电台开始在阿拉伯世界播音, 同时宣称把建立自由的阿拉伯集团和摆脱帝国主义的影响作为埃及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1954 年 7 月 23 日, 纳赛尔在演讲中宣称"革命政府的目标是为了使全体阿拉伯人成为一个民族……捍卫阿拉伯国家的重任将首先落在阿拉伯人身

上, 而且他们也有责任去承担。"^{[1](p.11)}

缘于埃及的地缘政治地位, 纳赛尔充分意识到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支持, 对于埃及的安全而言所具有的十分重要的意义。这就像保卫低地国家曾经是英国外交政策的一部分一样, 保卫整个阿拉伯世界也是埃及对外政策的一部分, 而在考虑巴勒斯坦和叙利亚问题时尤其如此。纳赛尔政策的新颖之处就在于他能够从阿拉伯世界的地缘政治出发来考虑问题, 而以往的阿拉伯国家领导人没有谁能像他那样意识到这一点: 即阿拉伯国家政治制度虽各不相同, 但只要它们在政策上携手一致, 就能凭借其地缘优势和石油资源获得讨价还价的有利地位。纳赛尔已经注意到埃及作为最大的阿拉伯国家、伊斯兰教的一个中心和非洲的一部分所具有的特殊地位。他的这种分析, 理论上源于 1951 年前他在军事学院所学到的战略知识, 实践上源于他在巴勒斯坦战争中所获得的经验, 感情上源于他长期以来对阿拉伯民族事业的民族主义责任感。这种强烈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责任感, 是导致后来他所奉行的反对西方国家特别是英法以及对以色列采取敌视政策的一种主要动因, 也是埃及和阿拉伯国家长期以来遭受外国奴役的历史记忆在其心理上的积淀。在他那本著名的小册子《革命哲学》中, 纳赛尔机智过人地用类似丘吉尔"三环外交"的模式演绎出埃及外交的"三个圈子"——阿拉伯圈子、非洲圈子和伊斯兰圈子, "不容置疑, 阿拉伯的圈子是这些圈子中最重要的、也是与我们联系最密切的。因为阿拉伯各国人民和我们的历史交织在一起。"^{[2](p.45)}应该说, 基于相同的历史、语言、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 是纳赛尔推行其阿拉伯政策的客观基础, 而出于埃及对外战略的考虑则是其主观使然。

作者简介: 王冰 (1961—) 男, 山西长治人, 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学院教授, 历史学博士。

埃及完全卷入到阿拉伯地区的事务之中是在 1955 年，这主要是出于对伊拉克和土耳其签订亲西方的巴格达条约的反应。因为这一条约使得该地区的政治力量重新组合，并导致了新的力量联盟的出现，从而迫使埃及完全卷入到整个阿拉伯中东地区的政治事务之中。为加强自身在这一地区的外交地位，埃及于 1955 年 3 月组建了一个与叙利亚、沙特阿拉伯和也门的联盟，并宣称这一联盟将成为扩大阿拉伯世界一体化的开始。这些在后来被称之为“泛阿拉伯主义”的举动还包括埃及与叙利亚签订的互助防御条约，以及与沙特阿拉伯签订的同盟条约，后来也门也加入其中。在某种意义上，这些条约是对伊拉克宣称的阿拉伯国家如不依靠西方便不能保护其自身安全的论调的实际回答。尽管这些条约并没有什么实际的军事意义，但它的重要性在于突出了埃及在阿拉伯世界的中心和领导地位。另一个有助于提高埃及在阿拉伯世界声望的事件，是 1955 年 9 月埃及与捷克的武器交易。在阿拉伯人眼里，这更进一步有助于说明埃及所倡导的摆脱西方影响的独立性，而它对埃及和阿拉伯人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这是纳赛尔面临着来自国内外的压力，尤其是来自埃及军方压力的情况下，所作出的合乎逻辑的反应。事实上，纳赛尔曾不断地要求英国和美国提供更多的武器，但是这些要求要么是被拒绝，要么就是因官僚机构渎职而耽误或是因议会而搁置。在美英相继拒绝满足纳赛尔提出的武器供应的情况下，纳赛尔得到了苏联愿意向埃及提供军事和工业援助的许诺，但苏联顾及到当时正在举行的美苏日内瓦高级会晤，而让捷克出面进行这一交易。与“东方”集团的交往增强了纳赛尔在阿拉伯世界中的声望，并使他作为中立主义和独立国家领导人的地位得到了显著的加强，而且也增强了整个阿拉伯的独立意识。

二

到 1955 年底，埃及在阿拉伯世界中已经占据了支配地位，这不仅使得埃及从中东国际体系的边缘地带进入了核心，而且还成为阿拉伯政治的中心，并使她所推行的以“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为代表的意识形态具有了更重要的意义。这一新的角色对埃及来讲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1956 年埃及宪法宣布“埃及是一个主权独立的阿拉伯国家，……埃及人是阿拉伯民族的一个组成部分。”^{[1](p.14)} 1956 年苏伊士危机后，纳赛尔在阿拉伯世界中的威望倍增，其影响也更大。1956 年 10 月 21 日，苏莱曼·纳布勒西（Suleiman Nabulsi）当选为约旦新政府领导人后，随即加入了由埃及和叙利亚组成的军事联盟，这样约旦、叙利亚的军队都置于埃及的统一指挥之下。1957 年 1 月，埃及、沙特阿拉伯、叙利亚、约旦签订了为期十年的互助条约。应该说这是纳赛尔所追求的阿拉伯统一事业最具有成就的时刻，在整个阿拉伯世界他得到了大多数阿拉伯民众及其政府的支持，这也促使他更加关注阿拉伯地区的事务，比之 1955 年以前，他的注意力已从埃及国内转向了阿拉伯世界。而苏伊士危机的解决也使得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更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也因此证实了纳赛尔所深

信的阿拉伯团结是埃及安全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的观点，这不仅仅是为了增强对以色列的防御，而且也是因为阿拉伯国家对石油和输油管道的控制对西方所产生的威慑作用；处理苏伊士危机的成功促使纳赛尔更加积极地寻求在阿拉伯世界发挥作用，他把自己看成是阿拉伯集团的代言人和领袖，而这个集团在历史、语言、文化和宗教等方面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埃及对外政策的这种新的定位，是它所采取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政策的合理产物。然而，1957 年艾森豪威尔主义出笼后，中东的形势发生了变化。此前在反对巴格达条约、与捷克的武器交易和苏伊士危机中，作为埃及最忠实盟友的沙特阿拉伯，曾一直紧密地追随埃及的阿拉伯政策，但在这一时期，它却逐渐脱离了埃及的阵线；另一个使纳赛尔在阿拉伯世界的影响受到打击的事件发生在约旦。1957 年约旦国王侯赛因指责埃及插手其国内的暴乱，由此导致两国关系的破裂。这样，到了 1957 年夏，纳赛尔只剩下唯一的一个盟友叙利亚。在短短的六个月时间内，纳赛尔苦心经营的联盟体系瓦解了。沙特阿拉伯不再追随埃及，约旦也中断了与埃及的外交关系，黎巴嫩则公开接受了艾森豪威尔主义，伊拉克针对埃及的宣传战展开反击。尽管如此，在阿拉伯世界中，纳赛尔仍然是一个最有影响的阿拉伯领导人，埃及对伊拉克仍然保有外交上的优势，但是，纳赛尔本人的形象在 1957 年夏季却受到了损害，只有叙利亚还保持着与埃及的忠诚盟友关系，而此时的叙利亚也深陷于一场国际危机之中。

位于阿拉伯北部十字路口上的叙利亚，是其邻国勾心斗角的对象。伊拉克想要吞并它，把它变成肥沃新月计划中的一部分；而由于与伊拉克王室的血缘关系，约旦也支持伊拉克的想法；在叙利亚的北部土耳其人虎视眈眈；甚至黎巴嫩人也对叙利亚持敌视态度，特别是当他们有把握得到美国支持的时候。另一方面，沙特阿拉伯也费尽心机想阻止叙利亚与埃及的合并。在叙利亚面临着来自各方面威胁的时候，要求与埃及联合的呼声不断传来并得到叙利亚复兴党的鼓励。在此之前，叙利亚总统库阿特利（Shukri al-Quwatli）曾经向纳赛尔建议两国按联邦的方式进行合并，但纳赛尔并没有作做出积极的响应。1957 年 3 月，纳赛尔在接受一家报纸的采访时说：“目前，我并不是按任何联邦或邦联制的思路在考虑问题……我比较喜欢诸如阿拉伯联盟这样的组织成为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强大且令人生威的纽带。”^{[3](p.220)} 在阿拉伯范围内，纳赛尔利用阿拉伯联盟这一组织，谋求其阿拉伯团结和统一的大业；同时也为谋求埃及在阿拉伯世界中的领导地位而加强对联盟的控制。毫无疑问，对于埃及而言阿拉伯世界和阿拉伯联合都是非常重要的。正是由于这一点，纳赛尔尤其重视阿拉伯联盟在埃及阿拉伯事务中的作用，并努力使其成为埃及对外政策的一个工具。正是在这一动机的驱使下，埃及把阿拉伯联盟完全控制在自己的掌握之中，并使得埃及人在阿拉伯联盟中占据绝对的优势，长期把持联盟秘书长一职，运用埃及财政对联盟预算控制，以及联盟总部的位置定在开罗等因素，对阿拉伯联盟施加重要的影响。在 1955 年的巴格达条约问题上、1958 年的黎巴嫩危机、

1962 年叙利亚危机和 1962~1967 年的也门战争中，均能够看到埃及对阿拉伯联盟的控制和操纵。纳赛尔热衷于阿拉伯事业，宣传阿拉伯联合，并把它作为击败帝国主义和创建一个强大的、繁荣的阿拉伯国家的一种工具。

看得出，纳赛尔对阿拉伯联合的首要兴趣是创建一条维护埃及和阿拉伯地区独立、反对外来势力的共同战线；其次是推动埃及的经济发展。埃及不像其他大多数阿拉伯国家，它有着作为一个单一民族国家的强烈自我认同感。很自然，它是以国家共同体来统一自己的行动，而不是以屈从于一个超民族联盟的思维方式来考虑问题的。1957 年 8 月份，库阿特利再次主动发出倡议，他宣称：“叙利亚最热切的希望是实现与埃及的联合，这一联合将是广泛的阿拉伯联合的核心。”^{[13](p.221)}但真正使得纳赛尔转变态度的是连续几个月的叙利亚危机。1957 年 9 月，纳赛尔发表声明谴责美国支使土耳其威胁叙利亚，他表示埃及将向叙利亚提供无条件支持，并坚定地站在叙利亚一边，“所有埃及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的潜在力量都将成为叙利亚坚强的后盾，这也是我们为了阿拉伯民族主义而战。”^{[14](p.23)}埃及因此向叙利亚派遣了军队，出于对叙利亚局势进一步恶化的担心，纳赛尔开始认真考虑埃叙两国的联合问题。埃及与叙利亚两国在历史上曾经有过联合的经历，他们曾一起阻止过蒙古人的入侵，伟大的萨拉丁也曾把他们的力量结合起来并最终将十字军赶出了巴勒斯坦。但两国在国民素质上，某种程度上在经济、社会结构上都有所不同。不仅两国人口数量相差悬殊：当时埃及约有 2500 万，而叙利亚只有 500 万；而且，在地理上两国也被分割开来，它们不仅没有共同的边界，而且本来可以成为其天然陆路交通的那一段路也必须穿越敌对的以色列国境才能抵达。除了与以色列接壤外，包围着叙利亚的是这样一国家：约旦、伊拉克、黎巴嫩和土耳其。这些国家都反对纳赛尔，反对其与叙利亚联合的政策，并对埃及势力的扩张感到恐惧。这正如纳赛尔已经预言过的，埃及与叙利亚的合并将引起一场国际风暴，它对阿拉伯世界的公众舆论产生了令人震惊的影响，而且使得中东其他国家以及大国的态度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苏联对联合表示出了复杂的心态，在庆幸叙利亚没有倒向西方的同时，对叙利亚共产党被解散而感到担忧。然而，在随后的几年里，叙利亚复兴党完全使自己的政策追随纳赛尔，并认可纳赛尔在阿拉伯世界中的核心地位，他们希望借助纳赛尔的声望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纳赛尔则强调联合后，叙利亚的政治体制必须按照埃及的体制来确定，所有的政党必须解散、叙利亚军队不得干预政治、在经济上不能存在两种模式、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和农业改革必须扩大到叙利亚。在这一基础上，阿拉伯联合共和国（the United Arab Republic）于 1958 年 2 月 1 日宣布成立。

三

在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宣告成立后不到两个星期，伊拉克和约旦也宣布组成联邦制国家，显然这是针对埃及与叙利亚合并所采取的行动，尽管这样的联合有着两国同属哈

希姆王族的缘故，但伊拉克无疑是这一联合中的主角，这使得约旦与伊拉克的联合多少带有了巴格达条约的痕迹。虽然由于艾森豪威尔主义的出笼，以及伊拉克、约旦和黎巴嫩接受了美国的援助，但紧随着 1958 年 7 月的伊拉克政变和黎巴嫩内战之后，纳赛尔在阿拉伯世界的声望急剧上升，他现在已经完全控制了叙利亚，黎巴嫩也最终与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确立了正常关系，在努里·赛义德（Nuri al-Said）死后，伊拉克也建立起激进的反西方的共和国，并在政治上奉行与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紧密合作的政策。1958 年 10 月，美军撤出黎巴嫩，接着英国也从约旦安曼撤军。但纳赛尔在 1956 年确立起来的在阿拉伯世界的优势到了 1958 年秋天之后，并未持续多久，第一个对这种优势进行挑战的阿拉伯领导人是突尼斯的哈比比·布尔吉巴（Habib Bourguiba），1958 年 9 月在阿拉伯联盟（Arab League）会议上，突尼斯激烈地抨击纳赛尔对联盟的控制，一个月后，突尼斯中断了与埃及的关系。这是自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成立以来，纳赛尔在阿拉伯世界中的优势地位所遭受到的第一次打击；接着更大的一次挫折发生在阿拉伯东方，1958 年 10~11 月间，早先曾对伊拉克加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抱有的希望，现在随着伊拉克国内的政变而化为泡影。为了避免使伊拉克成为西方阵营中的一员，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领导人对伊拉克国内局势的日益发展极为关注，特别是在埃叙联合前被取缔的叙利亚共产党势力的复活并与伊拉克建立起密切的联系，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对此作出了激烈的反应。1958 年 12 月 28 日，纳赛尔指责叙利亚共产党是分离主义分子，企图破坏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导致了叙利亚大批共产党人被捕。1959 年 1 月 20 日，埃及《金字塔》报主编穆罕默德·侯赛因·海卡尔撰文指责伊拉克新领导人卡塞姆（Kassem）对于共产党人的活动无动于衷。由于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积极地卷入到伊拉克的内部事务之中，最终使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到 1959 年 5 月，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同伊拉克的外交关系几乎完全中断。

在叙利亚，埃及的领导地位也开始遭遇各种各样的困难。埃叙联合之后，复兴党早期试图与纳赛尔分享权力的希望在 1959 年上半年就被破灭了，叙利亚人意识到纳赛尔不愿意让其他的阿拉伯领导人插手阿拉伯事务。埃叙之间分歧的第一次预兆发生在 1958 年 10 月纳赛尔组建第一届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政府时期，这一届政府的 34 名成员中只包括 14 名叙利亚人，而且许多关键性的部门都由埃及人掌握。^{[15](p.30)}到 1959 年期间，叙利亚人经常抱怨由于与埃及的联合，他们的政治地位受到了削弱。复兴党人认为合并的目的就是为了使“埃及和叙利亚阿拉伯化”，这是阿拉伯国家走向更广泛联合的第一步；他们希望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成立将不仅仅是埃及模式的延伸，而且还应该在思想意识和组织结构中反映出复兴主义和纳赛尔主义的思想；这两种思想的结合不仅适用于叙利亚，而且也适用于整个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甚至也适用于阿拉伯联盟；他们认为纳赛尔是一个具有凝聚力的核心人物，他的个人声望将给复兴党人的思想增加权威性，但纳赛尔所依靠的只

是叙利亚的军方势力，尤其是在政治上他与复兴党人的决裂，埋下了隐患；而在经济领域激进的变革又使得叙利亚人感到十分的不满。这样到了1961年，纳赛尔已经觉察到了叙利亚人的种种不满情绪，经过种种的迂回曲折，叙利亚和埃及终于走向了冲突的道路。1961年9月28日，一部分军官发动了政变，在短短一周时间里，叙利亚就脱离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这对纳赛尔的地位和他关于阿拉伯联合的梦想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也使得埃及与叙利亚在阿拉伯联盟中的对抗陷入一场危机。

在整个国家处于混乱之中时，叙利亚领导人曾希望与埃及的联合来拯救叙利亚，但最初对联合的那种喜悦很快就被一种不满所取代，叙利亚要求联合的愿望是由于受到民众中的纳赛尔的声望所刺激，而纳赛尔对此也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存在于两个国家中的差异和困难不同，其外部环境也不一样。首先，叙利亚与埃及在地理上被一个敌人——以色列和大海所分隔，从而阻断了大众之间的联系，而这是任何联盟的基础。还有其他一些重要的因素导致了这一联合的失败：复兴党的政治观点、军队在叙利亚政治中的影响、以及纳赛尔对叙利亚的弹压、埃及人在叙利亚军队和其他要害部门中所占据的优势地位，甚至叙利亚领导人的个性等等；包括来自于外部反对纳赛尔政策的阴谋，这都使得埃叙之间的联合面临着困境。叙利亚脱离埃及是对纳赛尔所追求的阿拉伯联合目标的一次沉重打击，也是他关于“三个圈子”的政策的一次重要挫折。在这之后，纳赛尔的阿拉伯政策便从“队伍的联合”转向“目标的联合”。^{[9](p.114)}他在“埃及作为一个国家”和“埃及作为一种革命”之间作出了区别。正如纳赛尔的发言人海卡尔所解释的：“作为一个国家，埃及将与所有的阿拉伯政府发生联系，而不论他们的政府形式是那种体制。这种联系在阿盟之中，在联合国中，并由此而发生防御、贸易、文化和其他不同的关系；作为一种革命，埃及则只与人民产生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将干涉别人的事务。否则这将与我们的一个基本原则相矛盾，那就是阿拉伯人民是一个单一的民族，因此，埃及作为一种革命将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信息传播给他们，而不是停留在边界上”。^{[9](p.115)}海卡尔的这一解释，表明埃及在处理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中，是以阿拉伯民族主义作为其指导原则，并以推动阿拉伯世界的“革命”作为其政策目标，这因此而注定了埃及将不可避免地更深地卷入阿拉伯国家内部事务之中，也由此使得纳赛尔所奉行的阿拉伯政策带有了“输出革命”的味道，甚至某种程度上成为干涉他国内政的口实。而这一切恰恰是在纳赛尔所倡导的阿拉伯团结和阿拉伯统一的旗

帜下进行的，这使得阿拉伯国家在接受纳赛尔思想的同时，又对其具体的措施表现出谨慎的防范。因为，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都试图维护自己的民族国家利益，若是为了阿拉伯团结和阿拉伯统一而牺牲自己民族国家的利益，这在当时多少是有些勉为其难的。也正是如此，纳赛尔宣布他将不再与阿拉伯反革命分子进行合作，因为他不能接受他们破坏阿拉伯团结的行为，为此，纳赛尔宣称，“我在讨论阿拉伯队伍上的联合之前，我将要求目标上的阿拉伯联合”。^{[9](p.115)}应该说这是纳赛尔在实现其阿拉伯联合的远大抱负之前，试图首先在阿拉伯世界寻求意识形态上的统一；而这种意识形态上的统一，鉴于阿拉伯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宗教等因素，完全可以诉诸于阿拉伯民族主义这一形式，并把它作为一种政治动员的手段，尤其是在阿拉伯世界的民众当中；依托这种外在的形式，再加上纳赛尔本人的“卡里斯玛”品行，从而使得埃及在阿拉伯世界中承担起领导者的角色。

纳赛尔的阿拉伯政策，是其对外政策的一个主要方面。这一政策主观上是基于情感基础上的对所谓“阿拉伯民族”的认同；同时客观上又是以阿拉伯国家中居民的高度同质性为前提的；由于阿拉伯人共同的文化、语言和宗教遗产，也由于历史上阿拉伯人在伊斯兰教统治之下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对未来统一的愿望，这使纳赛尔得以把这一政策作为其实现阿拉伯联合和统一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把它作为反对西方国家对阿拉伯内部事务干涉的有力武器。纳赛尔的阿拉伯政策是埃及对外政策中的一种价值理念，它蕴涵在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思想之中，并随着阿拉伯联合共和国（UAR）的建立，达到了它的顶峰。在纳赛尔看来，埃及与阿拉伯、非洲和穆斯林世界有着明显的联系，在这其中“阿拉伯圈子”与埃及的关系最为紧密。而当埃及卷入到阿拉伯地区的政治事务之中，特别是巴格达条约组织创建之后，这种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意识就更为强烈；也使埃及人对“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认同就变得更明显、更直接和更为自觉，以至到1958年纳赛尔能够宣称“阿拉伯民族主义不仅仅是一个词汇和一句话；它是一个伟大和高尚的原则”。^{[1](p.129)}正是这一所谓“伟大和高尚的原则”不仅导致了埃及与叙利亚的联合，而且使埃及深陷也门内战之中，同时还与西方国家发生的激烈的冲突。阿拉伯政策为纳赛尔在“阿拉伯圈子”中谋得了更加广泛的外交空间，但同时又因这一政策而导致了与大多数阿拉伯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并最终为解决同西方大国和以色列的冲突造成消极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A.I. Dawisha, Egypt in the Arab World: the elements of foreign policy,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76.
[2] [埃及] 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 革命哲学[M]. 北京: 世界知识社出版, 1956.
[3] [英] 罗伯特·斯蒂文思. 纳赛尔传[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2.
[4] Edited by Dan Hofstadter, Egypt & Nasser, volume 2, 1957~1966, Facts on File, Inc. New York, 1973.
[5] Tawfig Y. Hasou, The Struggle for the Arab World: Egypt's Nasser and the Arab League, London, 1985.